

顾黄初

语文教育文集外集 下



程雪如

語文教育文集外集



顾黄初

语文教育文集外集

下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书 名 顾黄初语文教育文集外集（上、下）
作 者 顾黄初
责任编辑 沈静明 金 玲 余立新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苏教网址 <http://www.1088.com.cn>
照 排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电话 025-57572528）
厂 址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邮编 211523）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总 印 张 82.5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9-3478-2
总 定 价 168.00 元（上、下册）
网店地址 <http://jsfhjy.taobao.com>
新浪微博 <http://e.weibo.com/jsfhjy>
邮购电话 025-85406265, 85400774 短信 02585420909
盗版举报 025-83658579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顾黄初语文教育文集外集：上、下册/顾黄初著. --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 9
ISBN 978-7-5499-3478-2

I. ①顾… II. ①顾… III. ①中学语文课—教学研究—文集 IV. ①G633. 30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1724 号

第三编 语文教育家研究

语文教改史上一份珍贵的记录^①

——读刘半农著《应用文之教授》

1918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一期,发表了刘半农的一篇文章,题为“应用文之教授”,提出了改革传统语文教学的主张,并具体介绍了他从事语文教改的实践经验。这是“五四”运动前夕“文学革命”理论建设方面的一篇重要论著(蔡元培曾把它编入《新文学大系·理论建设集》),同时也是我国现代语文教改史上一份弥足珍贵的记录。在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今天,重读这篇文章,回顾当年那些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奋起改革旧中国道德文章的蓬勃生气和战斗业绩,对于我们在新的长征途中批判继承历史遗产,进一步明确语文教改的方向,坚定语文教改的信心,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语文教学作为一种培养一代青年品德才智和文化素养的重要手段,它的动向总是同一定时代思想政治斗争的趋势相联系,并成为反映和推动这一斗争的敏锐而有力的一翼。刘半农从1916年下半年起开始为《新青年》撰稿,1917年5月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积极参与了“文学革命”的理论建设。与此同时,他又同沈尹默等人把“文学革命”的理论运用于语文教改的实践。在他1917年秋担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员时,便有意识地进行了教材和教法方面的大胆革新,以此作为实现“文学革命”的手段之一。当时,理论的探讨和教改的试验,就是他们努力的两个方面,对此,刘半农自己就曾明白地说过:“《新青年》同人所主张的”,“目下还在试验时代,试验的方法,一方面是各就所知,大家把自己的主张见地,与社外社内的同志,平心静气的讨论,务要找出个‘真’字来;一方面是根本可此项主张见地,在教授学生时实事求是的试验,务要使自己良心上觉得有些是处;这两种试验的结果和经过情形,都随时在《新青年》上披露”(《通信》,见《新青年》第四卷第三期)。而《应用文之教授》一文,正是刘半农把他在北大预科进行语文教改实践的“结果和经过情形”公之于众的一篇重要的实况记录。自那以后,随着“文学革命”运动的日益扩展和深入,叶圣陶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上发表了《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1919年1月),《平民教育》第六号开展了“中学校

^① 作者注:这是我研究现代语文教育史的开蒙之作。我是偶然翻读《新青年》杂志时发现这篇珍贵史料的。论文写成之后,发表在山西《语文教学通讯》1979年第3期上。署名时第二作者是张源潜老师,其时我与张老师共同负责中文函授教育的教材编写和《语文函授》编辑工作。我们讨论后由我执笔完稿。

国文教授的讨论”(1919年11月),陈文华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在《平民教育》第十八号上报告了《我之改革中学国文教授底试验》(1920年2月),涌起了我国现代语文教改史上的第一股浪潮,这股浪潮虽未形成摧枯拉朽之势,却也有力地冲击了千百年来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控制下陈腐的语文教学内容和僵死的语文教学方式。从这样的背景下来看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其在历史上的影响和意义确是不容忽视的。

《应用文之教授》一文大致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教学的宗旨,第二部分讲阅读教学,第三部分讲作文教学。在阅读教学方面,先讲选材,后讲教法;在作文教学方面,先讲注意事项,再讲命题,后讲批改。举凡语文教学中的一些主要问题,文章都涉及了,并且提出了不少新鲜的、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在当时固然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在60年后的今天,读来也还使人感到既中肯又亲切。

五四运动是以讲科学、争民主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其前奏的,当时提出的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主张,都离不开科学和民主两大内容。刘半农在语文教学方面提出的主张和试行的改革措施,同样是以科学和民主为其灵魂和准绳的。

科学精神,究其实质,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刘半农在《应用文之教授》的“开宗名义第一”里为自己规定的教学宗旨,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字。他说:“我在教授之前,即抱定一个极简单的宗旨,曰:不好高骛远,不讲派别门户,只求在短时期内,使学生人人能看通人应看之书,及其职业上所必看之书;人人能作通人应作之文,及其职业上所必作之文。更作一简括之语曰,‘实事求是’。”过去,在封建科举时代,读经习文是晋身官场的必由之路,教授八股文,学写试帖诗,无非是为了对付“三场闹墨”。“民国”以来,科举制度废除了,随着西洋各国先进的社会思潮和科学技术的传入,人们的视野以及人们所需要掌握的新知识,也越来越广泛,这时读书习文已经不完全是为了追求仕途功名,而是为了掌握一种具有重要社会功能的、表情达意的工具,以适应工作和生活的需要。可是,当时学校中的国文教授法却偏偏仍“在科举的旧轨道中进行”,“换汤不换药”(引文凡未另注出处,均引自《应用文之教授》)。有人调查当时小学校里的作文题后,慨叹地说:“《华盛顿论》、《王安石论》、《爱菊说》、《爱竹说》、《郭子仪单骑赴会论》、《岳武穆奉诏班师论》,以迨各种策论及古奥之说明文等等,竟数见不鲜。”(《通信》,见《新青年》第四卷第五期)其结果,学生“读书数年,能做‘今夫’、‘且夫’,或‘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的滥调文章,而不能写通畅之家信,看普通之报纸杂志文章”;及至踏入社会,“学实业的,往往不能译书;学政法的,往往不能草公事,批案件;学商业的,往往不能订合同,写书信”。总之是言文相悖,学用相违,完全脱离了实际。刘半农针对传统教学的这一流弊,鲜明地提

出:语文教学决不是读写充满八股文陈腐气息的所谓“文学文”,而是读写为实际工作和生活需要的“应用文”。“五四”时期的所谓“应用文”,同我们现在所说的应用文,内涵并不一样,对此蔡元培曾作过简明的解释:“应用文,不过记载与说明两种作用。前者是要把所见的自然现象或社会经历给别人看。后者是要把所见的真伪善恶美丑的道理与别人讨论。都只要明白与确实,不必加别的色彩。”(《国文之将来》)可见,刘半农所指的应用文,实际上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记叙文、议论文和说明文的总称,是指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在工作和生活中必须会读、会写的一般文章。刘半农为自己规定的教学宗旨,冲破了传统语文教学的桎梏,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这在当时确是新人耳目的创举。

科学精神,还意味着一种反倒退、反迷信的社会革新精神。这在刘半农的教改试验中体现得也比较鲜明突出。他在阅读教学中提出了12条选材标准,其中规定:“凡骈俪文及堆砌典故者,不选”;“凡违逆一时代文笔之趋势,而极意摹仿古人者——如韩愈《平淮西碑》之类——不选”,“凡思想过于顽固,不合现代生活,或迷信鬼神,不脱神权时代之习气者,均不选”;此外,那些“卑鄙齷齪的应酬文、干禄文”以及“谀墓文”也“一概不选”。他所要选的是“文笔自然,与语言之辞气相近者”,“思想学说,适于现代生活,或能与西哲学说互相参证者”以及“文章内容与学生专习之科目有关系者”。在刘半农看来,选讲的文章犹如“蚕吃的桑叶,吃不着他,固然要饿死;吃了坏的,也要害瘟病”。那些思想陈腐、形式僵死的文章,读了要害“瘟病”;只有内容和形式适合于时代进步潮流的文章,读了才真正有益。在作文教学方面,他定下了12个注意事项,其中特别强调:“要以记事明畅,说理透彻为习文第一趣旨”,并规定作文要“勿落前人窠臼,勿主一家言,勿作道学语及禅语”;“勿用古字僻字”;“不避俗字俗语,即全用白话亦可”;“勿打滥调,勿作无谓之套语……凡古文家、四六家、八股家之恶习,宜一概避去”。读写两方面,贯彻的是同样的精神,这种精神同他们在《新青年》上鼓吹西哲的进步学说,宣传无神论、倡导白话文等等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科学精神还要求人们严格地按照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刘半农并非研究教育学的专家,但资产阶级进步文化所提供的大量事实却使他明白无论是“治学”还是“教学”都必须努力去探索对象的固有的规律,这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应用文之教授》一文中所提出的一些主张和措施,当然不能说全都符合语文教学的客观规律,但其中有一部分却确乎颇有见地,值得研究和借鉴。例如关于读和写、理解和表达的关系问题。刘半农认为在语文教学中,作文“比选讲尤为重要”,“研究应用文,着手第一步,便抱定了‘要能作应用文’的目的,……选讲两方面,其实都是个‘作’字的预备而已”。否则,“读了一世书,自己半个大字不做”,

那么,除了自诩“博古通今”以外,于人于己都无实际用处。正因为刘半农认定在教学中选讲一定数量的范文,目的在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写作的能力,所以他在讲解范文时着力点也放在“运用”上。他给自己规定的讲课要求共十条,其中第四条是:“艰深之字义,费解之典故,均探求其来历及出处其用于本文中之当与不当,与作文时能否仿用,亦详细说明。”第五条:“古奥之文句,依文法剖析之;且说明其合与不合,及作文时能否仿造。”他说:“古人用字用典及造句,尽有谬误百出,万万不宜盲从者,故于四、五两条尤为注意。”这种以阅读为基础,以写作为中心,用阅读来指导写作,把阅读和写作密切结合起来的构想,应该说是比较符合语文教学的规律的。至于作文教学,历来的学馆家塾根本没有一套科学的训练方法,儿童一开笔,就是命题作文,而且命题大都出自四书五经,学生是有本固可照套,无病也得呻吟。到头来,除了满纸八股老调,写不出一篇真正文从字顺的像样文章来。刘半农则一反过去的传统老套,从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多种需要着眼,设计和安排了许多不同的作文训练方式,现将这些方式引述于下(每项后面方括号内的提示,为笔者所加):

1. 出一记事文或论文题目,由学生自由作文(这是老法)。〔命题作文〕

2. 说一段文字,令学生笔述,不许增损原文。〔听写〕

3. 译白话文为文言,或译文言为白话。〔翻译〕

4. 化韵文为散文(如古诗及白香山纪事诗,均可改作散文,兼采辞曲)。

〔改写〕

5. 以“讲的方面”第六条(指选文内容的分析研究)研究之结果,令学生撰为论文或笔记。〔听讲心得〕

6. 以一段冗长之文字,令学生删繁就简,作一短文,其字数至多不得逾原文三分之一。〔缩写〕

7. 就其专习之科目,出种种应用题目,令学生实地研习(如记载实验、解析学理、辩论、批牍、商业通信、订立合同等,各视所专习之科目定之)。〔应用文习作〕

8. 以一段文字,抽去紧要虚字,令学生填补之。〔填写〕

9. 以一篇不通之文字——或文理不通而意义尚佳之小说杂记等——令学生细心改订,不许搀入己意。〔修改文章字句〕

10. 以一篇文字,颠倒其段落字句,令学生校订之。〔整理文章脉络〕

11. 以一段简短之文字,令学生演绎成篇。〔扩写〕

12. 预先指定一书,或一书之一部分——其篇幅以一万字至三万字为限,且文义不宜高深,要以学生能自行阅看,全无窒碍为度——令学生阅看,即提纲挈领,作一笔记,或加以论断,字数不得逾千。〔读书笔记、书评〕

这 12 种几乎包容了学生出校以后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可能碰到的运用语文学工具的主要方式,同时也相当全面地概括了人们驾驭语言以表情达意的多方面的技能技巧。如果能够循序渐进地作恰当的、合理的安排,无疑是有利于促进作文教学科学化的。应当肯定,刘半农在 60 年前所苦心经营的这些体现了科学精神的教授法,至今仍有其生命力。

《应用文之教授》一文所反映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民主精神。历来在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下形成的那一套传统教学法,都是把学生当作盛物的容器、装书的箱柜的,学生在塾师面前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不能发挥任何自由思想和主动精神。刘半农的教改试验却处处注意调动学生的积极思维和学习主动性,这同政治上倡导的民主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例如,在“授课之第一日”,他就把字法、句法、章法等三个方面,“昔之所重而今当痛改者”和“昔之所轻而今当注重者”,分别列出一个表来,并“一一举例证明之”,使学生在开始学习之前,对于文章的优劣美丑的判别,就有一个鲜明而确定的标尺,以后在学习过程中可以自行评断和鉴定。此外,在开笔作文之前,他还拟订了十二个注意事项,对作文如何审题、如何安排结构、如何列提纲、如何确定主题思想、如何用字造句,乃至如何按时完卷、如何注意书写等等,一一提出了明确要求。这 12 条,相当于作文的“要领”,每次作文,学生都要拿出来阅读一遍,使自己从构思到落笔不致离谱脱轨,完卷以后还可以认真对照。这些措施,确实是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着眼的,若不流于形式,可以取得好的效果。

试论叶圣陶的语文教学思想^①

1949年初,叶圣陶先生怀着对人民革命事业的无限深情和对祖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无限热忱,在党的召唤下,由上海转道香港到达北京,迎接伟大的新中国的诞生。这位在旧中国饱经忧患而斗志弥坚的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和出版工作者,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他几十年从事教育、出版和语文教学研究工作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也由于党和人民的关心和重视,得以在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上发挥其理论指导的作用。

“系统地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使国文教学完全合于人民的要求”^②,这曾经是圣陶先生和所有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进步教育工作者梦寐以求的愿望。新中国的建立,就为实现这一愿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建国以后的十七年,在党的直接关怀下,中小学语文教学曾经进行过多次的改革。当时担任中央出版总署副署长和中央教育部副部长的圣陶先生,在这些教改活动中,既发挥着组织领导作用,又承担着理论指导任务。他通过作报告、写序跋、发专论、答函件等各种途径,在总结解放区教改工作经验和国统区进步教育工作者某些革新尝试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语文教学问题的基本观点和主张。这些观点和主张,尽管一度被诬为“封资修”,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在语文教育领域所造成的空前浩劫,从反面证明了圣陶先生所坚持的正是合乎科学、合乎语文教学客观规律的正确观点和正确主张,因而有强大的生命力。

在语文教学问题上,圣陶先生的基本观点和一贯主张大致可以概括为这样四个主要方面:

一、“学生须能读书,须能作文,故特设语文课以训练之。”^③这是圣陶先生对语文教学的性质和任务的基本观点

早在40年代,圣陶先生就明确提出国文教学的目标在于“养成阅读书籍的

① 作者注:这是我研究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后发表的第一篇专论。缘起是我在从事中学语文教师在职培训工作(函授)时,为本地区广大参加函授的第一线中学语文教师按函授教材进行面授辅导,应学员要求在每次上辅导课时穿插安排有关叶圣陶语文教育思想的专题讲座。这是讲座的讲稿。河南郑州《教学通讯》编辑部的立析同志要求在他们的刊物上发表这份讲稿,后经整理发表在该刊1981年1月号上。也正因为这篇论文发表后为语文教育界同仁认可,于是在第二年应邀为全国首届“叶圣陶语文教育理论讨论会”上作主题报告。

② 《关于语言文学学科的问题》。

③ 《语文教育书简》,《教育研究》1979年第三、四、五期。

习惯,培植欣赏文学的能力,训练写作文字的技能”。前两项就是“读书”,后一项就是“作文”。而读书、作文的工具是语言(文字),所以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就在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用语言(文字)正确地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作文”的能力和通过语言(文字)正确地理解旁人思想的能力——“读书”的能力。这是圣陶先生一贯坚持、反复宣传的一个重要观点。这个观点决定和派生出他对语文教学中其他问题的看法。

例如政治思想教育在语文课中的地位问题。圣陶先生历来认为,语文课本中的教材必须“旨趣纯正,有益于青年的身心修养”,因为“国文教学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义”。^① 建国以后,学习了党的文教政策和解放区语文教学的经验,他更明确认识到“用思想正确、感情健康、富于战斗性的文学作品和普通文教育学生”的重要性。^② 但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始终认为语文课的基本任务还是在于训练和提高学生读书和作文的能力,这一点不能动摇,也不能含糊。对此,他曾反复阐述过这样三个观点:第一,学校里的各门课程,既有共同任务,又有各自的专门任务。思想教育是各科的共同任务,读写训练则是语文学科的专门任务,前者不能取代后者。他很早就批评“五四”以来国文科教学的偏颇,“专重精神或思想一面,忽略了技术的训练,使一般学生了解文字和运用文字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认为这是当时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重要原因之一^③。在他看来,“训练思想,就学校课程方面说,是各科共同的任务;可是把思想、语言、文字三项一贯训练,却是国文科的专责”^④,因此语文教师“把精神训练的一切责任都担在自己肩膀上,实在是不必的”^⑤。第二,思想和语言是不可分离的,语文课上进行思想教育丝毫也不能脱离语言的讲读和训练。换句话说,通过语言因素的分析深入领会课文的思想内容和感情,使学生在学会语言的同时受到潜移默化的思想感染和感情熏陶,这正是语文课发挥思想教育作用的独特方式。尤其是课本中那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是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好教材,通过这些艺术形象的分析,培养学生丰富的、健康的审美情操和能力,更是语文课责无旁贷的任务。所以他在解释所谓“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也不要将语文课讲成文学课”的提法时,曾说:“课本之中各体各类之文都有,……故政治性之文而不言政治,文学性之文而不及文学,断无此理。所

① 《对于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国文教学》。

② 《谈语文教本》,《国文杂志》二卷第六期。

③ 《国文教学·序》。

④ 《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

⑤ 《对于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国文教学》。

谓‘勿教成’云云者，勿舍本文于一旁而抽出其政治道理而讲之，或化作品之内容为抽象之概念与术语而讲之也。……果能引导学生细读本文，获得透彻之理解，则学生非徒理解而已，其思想感情必受深切之影响。语文教学之思想政治教育之效果，宜于此求之。”^①第三，语言训练也就是思维能力的训练。学生要正确地认识世界，除了要端正思想立场以外，还得具备严密而有条理地进行思维的能力。而语文课上，正是要“进行严格的语言训练，来发展学生的语言能力同时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况且，语言又是“教跟学之间的中介”，“正确地进行语言教育，让学生认识语言现象，掌握语言规律，提高他们通过语言掌握内容的能力，因而可以提高学校全部教学的质量”^②，这是直接关系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大事，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以上三点从不同的角度显示了语文教学所肩负的任务的特殊性质，可以说是圣陶先生对于语文教学与政治教育相互关系的全部见解的精髓。

二、语文教材只不过是进行语文训练的一个“凭借”，“有了凭借，历练才有着落”^③。这是圣陶先生对语文教材的性质和作用的基本观点

既是“凭借”，就有选材是否精当、编排是否科学，对于语文训练来说，是否能发挥最大效能的问题。圣陶先生一再强调：“能力的长进得靠训练，能力的保持得靠熟习，其间都有个条理、步骤。”^④因此作为凭借物的语文教材就必须与这些“条理”和“步骤”相适应，形成一个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读写能力的科学体系。为此他曾作过多次的探索：以“文话”为中心，“文话”、“文选”、“文法和修辞”、“习问”四项组合成一个单元，集108个单元构成初中阶段语文教学的全部内容——《国文百八课》的编辑；文言文、语体文分别编制，使之各成一个知识系统和读写训练步骤——《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乙种的编辑；语言教育、文学教育相互联系又各成系统，使之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的经验。这些探索的指导思想，就是力图建立起语文学科的学科体系，使语文教材这个“凭借”在培养和提高学生读写能力方面能发挥出最大的效能来。

正因为圣陶先生把语文教材看作是一种“凭借”，而把语文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当作是目的，所以他在全国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更进一步地强调：为建立语文学科的科学体系，当前“特别需要调查和研究的是语文训练的项目和步

① 《语文教育书简》，《教育研究》1979年第三、四、五期。

② 《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国文教学》。

③ 《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序》。

④ 《关于语言文学分科的问题》。

骤”，“至于教材选多少篇，选哪些篇，这些文篇怎么编排，我看未必是关键问题，也未必说得多少道理来”，因为“选些文篇让学生读，无非是进行那些训练的凭借而已。不读这几十篇几百篇，换读另外的几十篇几百篇，也未尝不可”，而我们“一向在选和编的方面讨论得多，在训练的项目和步骤方面研究得少，这种情况需要改变”。^①这一番话，可以看作是他历来对于语文教材性质和作用的基本观点的发展，也是他总结自己和他人几十年来在语文学科的体系方面所作的探索之后得出的新的结论，因此在广大语文工作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于语文训练的项目和步骤，“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里，已有不少人在摸索，只是限于当时的条件，这些努力还是分散的、时断时续的。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高校招生制度的改革，语文能力的训练日益被人们所重视，在训练项目和训练步骤的设计上也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可以预见，圣陶先生的这个重要讲话，必将在建立语文学科体系、彻底改革语文教材方面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教师教各种学科，其最终目的在达到不复需教，而学生能自为研索，自求解决。故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授予，而在相机诱导。必令学生运其才智，勤其练习，领悟之源广开，纯熟之功弥深，乃为善教者也。”^②这是圣陶先生对各科教学包括语文教学方法的一个基本观点

圣陶先生认为，语文教学既然目的在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终身受用的读写能力，而语文教材又不过是一个“凭借”，学生离校以后还有大量的书要读，大量的文要作，那么，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就不该巨细无遗，喋喋不休，而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引导”和“点拨”上。一方面，“怎样阅读才可以明白通晓，摄其精英，怎样写作才可以清楚畅达，表其情意，都得让学生们心知其故”^③；另一方面，“须令学生有所事事”^④，让他们“自奋其力，自致其知”，通过自己的实践去求得“真知”和“真能”。这样，教师“举一”，学生便能“反三”；教师把钥匙交给了学生，学生便能自去“开发无限的库藏”。语文教学的得法与否，关键就在于此。

在圣陶先生所说的“引导”和“点拨”中，还包含着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读写习惯这层意思。他在早先就曾这样强调过：“教育的本旨原来如此：养成能力，养成习惯，使学生‘终身以之’。”^⑤“教育的本旨”如此，语文教学何能例外？他说：

① 《敬祝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成立》，《语文学习》1980年第一期。

② 《语文教育书简》，《教育研究》1979年第三、四、五期。

③ 《对于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国文教学》。

④ 《语文教育书简》，《教育研究》1979年第三、四、五期。

⑤ 《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国文教学》。

“阅读和写作都是人生的一种行为。凡是行为必须养成了习惯才行”^①，“仅仅心知其故，而习惯没有养成，还是不济事的”^②。而为了要把“知”和“能”转化为终身以之的习惯，就得在学校中加强“历练”。

对于阅读教学和写作教学的方法，圣陶先生曾分别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其中关于读、写之间相互关系的精辟见解，特别值得注意。他不同意某些人“以为学习语文课之目的惟在作文，读书盖为作文之预备”，因而在阅读教学中“喋喋言作法，言技巧”。他认为“读书亦为目的”，“老师能引导学生裨善于读书，则其功至伟”^③，“若谓阅读教学纯为作文教学服务，则偏而不全矣”^④。这也就是说，培养学生读书的能力和习惯，同培养学生作文的能力和习惯，都是语文教学的目的。而且，在他看来，阅读应该是写作的基础，因为“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倾吐能否合于法度，显然与吸收有密切的关系”^⑤。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要“善读”，“果能善读，自必深受所读书籍文篇之影响，不必有意摹仿，思绪与技巧自能渐有提高”^⑥。为此，圣陶先生还在《语文教学二十韵》中特意写了足足十四行诗，强调了读写之间的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甚解岂难致？潜心会本文。

作者思有路，遵路识斯真！

作者胸有境，入境始与亲。

一字未宜忽，语语悟其神。

惟文通彼此，譬如梁与津。

学子由是进，智赡德日新。

文理亦畅晓，习焉术渐纯。

圣陶先生还认为，写作是一种技能，而不是什么“知识”。写作技能的提高，一要靠精心研读范文，从中提高选剔与斟酌的“识力”^⑦；二要靠勤奋刻苦练习，于实践中“自悟其理法”，那种以为多讲些写作知识就一定有助于学生写作能力的长进，“殊为不切实际之想”^⑧。这些经验之谈，对我们正确处理读与写的关

① 《文章例话·序》。

② 《对于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国文教学》。

③④ 《语文教育书简》，《教育研究》1979年第三、四、五期。

⑤ 《对于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国文教学》。

⑥ 《语文教育书简》，《教育研究》1979年第三、四、五期。

⑦ 《论国文精读指导不只是逐句讲解》，《国文教学》。

⑧ 《语文教育书简》，《教育研究》1979年第三、四、五期。